

L·S

历史揭秘

LI SHI JIE MI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坠机身亡真相

戴笠是乘坐 DC47 型 222 号飞机被撞毁而身亡的。然而关于撞机事件历来说法不一。笔者偶然在上海市档案馆阅到当年在戴笠座机撞毁前原定驾驶这架飞机的飞行员赵新披露其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被突然撤换下来的一段内幕资料，从而为事件真相提供了新的材料。

1946 年 3 月 13 日 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在空旷萧瑟的北平机场向执意前来为他送行的一行人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最后一次为我送行，下不为例。”戴笠深信麻衣相法，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日后竟被人视作了一种预示戴笠死期临近的谶语。4 天后，戴笠便在神秘的空难中毙命。

3 月 13 日戴笠飞抵天津，当时带有两项任务：一是整饬特务中利用肃奸进行贪污的现象；二是处理国民党第 94 军副军长杨文泉在津纳妾一事。为处理这两项事宜，戴笠在天津延迟到了 15 日。这时戴笠拟从天津再飞青岛会见正在那里的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与其商讨关于邀请美国驻青岛军舰协助蒋介石往东北运送军队、给养之事。但就在这天，戴笠在天津收到了由他向时任东三省保安司令杜聿明谈起成立军

警稽查处并推荐任稽查处处长的文强从东北发来的急电，电文说杜聿明将于 3 月 16 日在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动手术，割去左肾。电文建议戴笠借机前去探望。戴笠明白文强的用意。杜聿明现拥有美式装备的雄兵 10 万，军统在东北地区的活动有无杜聿明的支持是大不一样的。因此戴笠果断采纳了文强的建议，遂有了他在 1946 年 3 月 15 日夜的北平中和医院秘密之行。

北平东城市口大街同福夹道有一幢颇引人注目的楼房 这幢楼房是接收“日本航空株式会社”的过去是军阀曹锟的公馆。1946 年，直属于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空军空运大队”第一大队第二、第三中队队部即设在这幢楼内，其驻防基地在北平西郊机场。

1946 年 3 月 15 日下午，从原国民党作战部队被抽调到空运第一大队一个名叫赵新的飞行员在午后走进了这幢楼内。他这是按例到队部值班室看任务派遣牌。

任务派遣牌上这样写着：飞机：222 号专机，起飞时间：3 月 16 日上午 8 时，航线：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飞行员：赵新 冯俊忠。要求 3 月 16 日早 7 时前做完飞行准备。

赵新的家乡在上海。他是在“八一三”日本军队登陆上海时逃离家乡的。他已经有 8 年没有回上海了。思乡情切，离开部队值班室后，立即去了东安市场，买了不少北平土特产和工艺品。回到住地后，连夜装点好两个提包，打算驾机到上海后分送亲友。

1946 年 3 月 16 日清晨，赵新全面检查飞机的每个关键部位，以确保它启动后的绝对安全。赵新一共检查了两遍，直到他确认每个关键部位已万无一失，这才拿起飞机记录簿签

上字交给了一旁的机务员。

7 时 45 分 赵新登上飞机 作起飞前准备。

赵新清楚地记得，当他在驾驶座上坐安稳后，伸出手正要按下按钮启动发动机时，时钟正指向 7 时 55 分。也正是在这时，他忽然惊讶地发现在机头左侧下方的滑行跑道上飞速驶来了一辆吉普车，吉普车驶近时，赵新甚至都看得到吉普车上的人在大幅度地朝他挥着手，那情形显然是有什么十二万分的紧急情况要迅速传达给这位即将驾驶 222 号飞机升空的飞行员。

随着吉普车的越来越驶近，赵新已认出向他挥手的人是航校第 18 期毕业生，绰号叫小黑子的四川人张远仁。待到吉普车在飞机旁嘎然停住，赵新便从飞机上探头大声问张远仁是怎么回事。

“不要开机 有急事 队长让我来替换你！”张远仁在下面大声向赵新传达。

赵新的眉额猛地起皱，情绪中明显地流露出了他对这一临时变更命令的不满。当然，个中更多的因素是出于盼了多年的平沪之行好不容易，刚刚盼来却又突然被取消引起的扫兴和失望。尽管命令已下，但赵新还是忍不住问张远仁：“究竟出了什么事？”你快下来去见队长 见到队长你就知道了。”这时时针已指向了 8 点。前来接替他的张远仁亦在频频催他。赵新知道再在这里说什么已毫无意义，况且飞机起飞时间已到，也容不得赵新多问什么了。军人的天职本来就是执行命令。

坐在飞机上的戴笠对刚才发生在飞机起飞前 5 分钟内的事情并不清楚 然而 这 300 秒时间内发生的故事决定了戴笠

在第二天的飞行中必死无疑。

赵新回到部队找到了队长。队长对他说：“张远仁有急事要去上海，就派他替换你了，很抱歉！以后还会有机会去上海的……再说，队里的飞行员都派出去了，你来当这周的值星官吧。要注意派出去的飞机……”

赵新事后总算明白被换下的真实原因——

飞行员张远仁知道了赵新有去上海的飞行任务后，立即去向队长送礼，要求把这趟飞上海的任务派给他。他向队长坦言他知道上海近来黄金和美钞生意很好做，他去一趟一定能发一笔不小的财，但这时队长却心生犹豫，因为他不得不考虑张远仁的技术水平并不过硬。而张远仁显然也清楚队长会顾忌到这一点，于是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先提到了此次飞行上海的这架飞机上的另一位有着丰富飞行经验的驾驶员冯俊忠。接着又诡秘地看着队长说，请你也拿出点本钱让我带去上海，保管也替你赚回一大笔钱！

利令智昏的队长终于被张远仁说动，不再犹豫。接下来两人在 222 号专机起飞前夕，连夜准备停当，决定由张远仁于翌晨赶去机场，传达队长的紧急命令将赵新替换下来。

1946年3月16日上午，戴笠乘坐由张远仁和冯俊忠驾驶的 DC47 型 222 号专机从北平返回天津。在天津他没有过多的停留继续登上飞机直飞青岛。戴笠决定，在青岛小憩一夜，第二天上午直飞上海。据说与此同时戴笠还作出这样一项指示：人下机，所带行装物品均不下机；飞机停在青岛沧口机场，由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派特务严密看守，以确保飞机安全。然而尽管如此防范，传说中戴笠专机还是在这一地点这一时间里被人混上飞机安放了定时炸弹。

1946年3月17日上午，戴笠一到沧口机场即让机场和数小时后他的专机将降落的上海龙华机场联系，得知上海天气晴好只是下午可能有雨时，戴笠还是感到了宽慰，因为他认定这对他的此次飞赴上海不至于构成威胁。但是沧口机场还是根据航空气象的反映作出如此气候飞行会有危险的判断。然而戴笠此时一意孤行，执意要当日赶到上海，只是为了防范万一，他吩咐飞机师多多备足油料，一旦飞机因气候恶劣无法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就转飞南京，到那里先见过何应钦，然后再飞返上海。

222号专机从青岛沧口机场起飞以后不久即获悉上海气候恶劣，且有大雨，着陆困难。222号专机于是飞向南京方向。孰料到达南京上空，竟也遇上滂沱大雨。午后1时06分，222号专机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也听不见222号专机的讯号了。原来飞机撞在山上，机毁人亡。

对于戴笠之死，赵新作出如是分析，这一分析也正好可以结束本文：

“从张远仁和冯俊忠的飞行技术来分析，在一般气候条件下飞行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冯俊忠年龄大，飞行经验丰富，是能够胜任的。但他们都是在旧式的飞行训练中培养成才的，缺乏科学头脑和先进技术的训练，尤其对利用无线电波、单凭听觉的盲目飞行和利用无线电罗盘的定向飞行，他们全都没有学过。张远仁只是学过些初步的穿云下降理论，毫无实践经验。冯俊忠是广东航校的老前辈，凭经验飞行很出色，一遇到要使用仪表、电波、无线电等设备来飞行，就有困难了。他俩都未经过‘美国空军训练中心’严格的科学训练，因此不可能操作好仪表，盲目穿云飞行，尤其对电波和无线电航行设

备不会使用，一遇到气候恶劣等情况就缺乏应变能力，这就是这次事故的必然性。作为空运队队长对此情况本该有所预料，但他利令智昏居然怀着侥幸心理，利用自己的权力违反飞行纪律，以命令方式随意更换既定的飞行方案，这亦是事故发生的主因。”

至此，戴笠之死该真相大白了吧！

“洋钦差”李德怎么会当上“太上皇”

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都会知道李德这个名字，这个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曾是中国红军以至中共中央的“太上皇”他给中国带来了一段荒唐可悲历史，当年险些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谁能想到，如今种种资料表明，当年共产国际并未派出过这个“顾问”，1995年《传记文学》刊登了卢弘的文章《洋钦差李德之“？”》，披露了内情——

李德怎么会到中国，这一直是笔糊涂账，就连李德的出身来历，也有几个不同版本的回答。

当年为李德作过翻译的伍修权说，他当时知道的情况是：李德当年是个来自苏联的拿着奥地利护照的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德军下级军官，1916年被沙皇俄国军队俘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次年十月革命胜利，他参加了新建立的苏联红军，由于他当过兵打过仗，在苏军中颇受重用，一直晋升到某骑兵师的参谋长。后来又进入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曾到苏联远东和中国东北等地活动，1932年秋作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进入江西中央苏区。

中国党和军内多数人也是这么说的，美国名记者斯诺和

索尔兹伯里，在他们的有关著作中，基本上也是这一种说法。

然而李德在 1974 年去世以后，德国和苏联分别发表了有关他的经历及资料，却与以上说法大有出入。

这些材料说李德 1900 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城郊，在师范读书时参加了革命活动，1918 年才应征当兵，不到一年大战结束又回校读书，1919 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参加工人起义和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战斗，1921 年和 1926 年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于 1928 年越狱成功，逃到苏联并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9 年进伏龙芝军事学院，1932 年春毕业，同年来华。

这一说法主要来自德国的官方资料，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这又根本否定了当过俄军俘虏，参加过苏联红军，还当过师参谋长等等说法。此说从何而来，现已无从查考，到底如何，且当悬案。人们真正关注的问题是：

李德到底是怎样来到中国并成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

最早提出这一问题并有自己看法的是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于 1937 年去苏联治伤养病时，见到正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当面责问他说：

“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派）李德去中国的？你和李德事先谈了些什么？为什么博古完全依靠李德指挥军事工作？”

王明听了马上声明说，李德去中国是由苏军总参谋部委派的，他没有给过李德任何指示，共产国际也没有参与此事。

王稼祥说：“我断定这是鬼话……除了由王明派遣李德，不会有别人。把李德派往中国，美其名曰军事顾问，实质是掌握我党军权，此阴谋出之于王明无疑。”（见《红旗飘飘》第 18 辑，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

争》)

王稼祥是按照中共党内的传统观点这么说的，但是这主要是一种推理判断，并没有拿出多少确切证据，倒是王明的说法较有根据。当年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师哲老人，几十年后的几次回忆，实际上印证了王明说过的话。师老先后对笔者和陕西省党史研究者刘杰维说过内容相同的话。

“李德到中国去，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也不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中国东北去做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已占领中国东北的日本与德国是协约国盟友，他作为德国人去活动会比较方便。”

师老一直不同意说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去的军事顾问，认为凡是这样介绍李德的，都是“重要错误”。不过他对李德到底为什么又从东北到了上海，还当上了所谓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也知之不详。

这个疑团竟被我无意中得到了一个旁证性的答案。

几年前，我为一位老同志整理回忆录。她在 30 年初曾为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情报机构工作过，她的主要领导人就是苏联著名的情报工作者、德国人佐尔格，他主持的上海情报组织被称为“佐尔格小组”。我从那位老同志处知道了佐尔格其人及其在华活动，又从一本关于佐尔格的传记作品中读到这样几段：

佐尔格小组有两名成员于 1931 年 10 月被国民党军事机关查获逮捕，将要判处死刑。佐尔格了解到国民党方面只要有钱就可以另行考虑，从宽发落，便密电莫斯科，请苏军情报总部立即派专人送 2 万美元来上海 好营救被捕同志 打点国民党方面。书中写道：

组织上派两位德国同志担当秘密交通员。他们从北满地区出发，每人都为理查德·佐尔格抢救战友生命的重要使命带上了两万美元。他们互不了解，都是由总部单独派遣的……

党龄都已十多年的德国共产党老党员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引者注）和赫尔曼·西伯勒尔分别踏上了征途……

这两位送钱的德国共产党老党员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艰苦任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了目的地，交给了佐尔格。

在一本美国出版的《共产国际传记词典》上的“李德小传”中，也说：

1931年～1932年，他（即李德——引者注）在上海遇见了给苏联做情报工作的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

这些材料都表明，李德的到上海是与佐尔格，因而也是与苏军情报总部密切相关的，他的真正使命，只是一个为佐尔格送钱到上海来的“秘密交通员”，他的来华和到上海，与共产国际和王明并无关系，他当时根本没有“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

那么，李德到底怎么由一个苏军情报部门的“秘密交通员”，一下成为来自共产国际的“洋钦差”以至执掌中共中央军事大权的“太上皇”的呢？

“佐尔格小组”在上海活动中，由于也用共产国际的名义，与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经常联系。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及主要领导人博古等，也还在上海，他们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联系更多。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请示报告，共产国际对中央的各种指示，以及相互间的来往通信通报，都通过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进行。24岁就成为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博古，更是不断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请示请教。因此，中

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及佐尔格小组一直密切联系。

李德在上海逗留期间，自然地遇到并接触了博古。博古在苏联学习时，早就认识李德，这次是老友重逢，一个是他乡遇故知，一个是本土逢故人，自然格外亲切快慰，当时王明及共产国际总部，博古和中共中央机关，早就想对毛泽东进行排斥打击。可是，中央苏区又几乎每天都有战争，不可一天没有军事指挥，一旦把毛泽东彻底搞倒，一时还没有别人来接替他。不料喜从天降，老朋友李德忽然来了，博古得知他已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还是这所最高军事学府的高材生，又参加训练过红军部队，是个科班出身的军事人才，甚至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专家，他便鼓动李德留在中国，帮助他指挥红军作战。

那年李德刚过 30 岁，正是血气方刚、踌躇满志之时，博古的话不由使他心驰神往。但是出于组织纪律规定，就由博古向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作了请示。其实当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内已有一位正式任命的军事顾问，名叫弗雷德。只是此人显然比李德“官”大，博古同他与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尤尔特商讨后，又由尤尔特将博古的建议发电请示共产国际总部。

几经周折，共产国际才复电表示，李德可以作为国际代表团正式军事顾问弗雷德领导下的军事人员，在苏区了解并及时报告情况。共产国际在回电中明确指示：李德“没有指示权力”，并且一切都得听命于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及其军事顾问弗雷德。李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也承认并肯定了这个事实。由此看来，他实际上是以一个联络员身份去苏区的。

尽管李德不是直接由共产国际正式派来的，他却在博古

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的合作导演下像模像样地打着共产国际旗号，挂着军事顾问招牌，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军政舞台上。

遗憾的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李德就把毛泽东、朱德等人用成千上万人鲜血和生命浇铸成的中央苏区，搞得兵败如山倒，失地如卷席！直到遵义会议，李德才不得不收场下台。

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曾招呼周围同志，念博古是我国同胞本党同志，对他批评要留有余地，别伤感情。但是李德不在此例，对他不妨集中火力猛烈攻击。所以连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张闻天、王稼祥等，以及一向宽厚待人的朱德和生性耿直的彭德怀，都一齐指着李德的鼻子严厉批判和痛加指责。人们从他的错误指挥到粗鲁作风，从他的纸上谈兵到妄自尊大，进行了无情揭露与全面批判，最后一致同意把他轰下台。

这场“全党共诛之，全军共讨之”的批斗会，开得李德暴跳如雷又无计可施。他满腹委屈地既是牢骚又是声明地说，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连同其顾问身份，都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才干的，对于人们把一切罪责都加到他头上“实在受不了”。连长期忍气吞声地为他作翻译的伍修权，后来也讲公道话说：

“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

既非中共党员，又非李德同胞的斯诺在访问过中共要人以后，也不偏不倚地说：

“应该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在江西应负责的实际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他成了共产党为自己吃大亏进行辩

解的一个重要借口。他成了一个骄横跋扈的外国人，害群之马，替罪羊；能够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总是使人感到亏心的事。”

斯诺又说：“无论如何，李德的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以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决不会重犯了。”

薄一波自述 1936年9月出狱经过

在“文革”中，“四人帮”一伙制造的所谓“60人叛徒集团”曾轰动一时，许多无辜的人因之而受株连。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薄一波文集》收录有《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斗争——兼答1936年9月出狱经过》一文。这是薄一波同志在“文革”受审期间所书。他以当事人身份把所谓的“60人叛徒集团”真相披露于世。1993年第2期《学习》杂志率先刊登了此文。现摘录如下——

两位红卫兵要我写出草岚子监狱（即“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情况和我1936年出狱的经过。我考虑过了，认为有必要把这段历史写清楚，公诸于众。

在我还未来到这里以前，就看到过一篇红卫兵驻国家经济委员会联络站油印的小传单，上面是一个集体的《启事》。在《启事》上署名的有9人：徐子文（即安子文）、周斌（即周仲英）、杨仲仁（即杨献珍）、徐之荣（即徐子荣）、董旭生（即董天知，已在抗战中牺牲）、张永璜（即薄一波）、刘华甫（即刘澜

涛)夏维勋 (即洗维勋 已在抗战中牺牲了)冯俊斋 (即马辉之)这个《启事》登在民国 25 年 8 月 31 日和 9 月 1 日、2 日的伪《华北日报》上。

登《启事》是事实。当时 (1936 年 8 月下旬)被监禁在北平西安门里草岚子监狱的政治犯，在这个《启事》上捺手印出狱的 不只上述 9 人 共有 60 个人左右。

登《启事》出狱 岂不都成了自首变节分子了么 不是 完全不是。草岚子监狱是一个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场所。他们的出狱，是经过长期残酷斗争的结果，是上级党组织的决定，他们做得没有错。

这些同志从被捕入狱到根据党组织决定假自首出狱，有一段曲折的斗争过程。

顺直省委和河北省委的大破坏

1931 年 1 月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会上 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 在继续批判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又被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所统治。会后，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 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各地去 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2 月 顺直省委 (它管理的范围差不多是整个华北地区)遭到了大破坏，30 多人被捕。省委机关遭破坏后，中央又陆续派来一批人重新组建了河北省委。省委机关随后迁至北平。当时，党内情况仍很混乱，新来的人跟下面不联系或联系不上；原来的人有的对六届四中全会极度不满，有的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都不积

极工作。而北平基层组织又与党失掉了联系，单独活动。就在这个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于 4 月在武汉被捕叛变，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 6 月在上海被捕叛变，给党造成了很大损失。6 月份，河北省委又遭到大破坏，由于出了很多叛徒，破坏的面特别大，包括天津、北平两个市委的人员在内，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被捕入狱者达 300 多人（其中有些不是共产党员）。我就是在这一次省委遭大破坏中，被叛徒廖划平出卖而在北平被敌人逮捕入狱的。

在伪北平宪兵司令部拘押期间

伪宪兵司令叫邵文凯，自称是东北军的“革新派”。这里纠集了一批共产党的新老叛徒和国家主义派组成的审讯团，专门对付共产党和抗日青年。省委第二次大破坏就是他们搞的，被捕的人全部关押在北平东城帽儿胡同看守所。

审讯团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采取突击审讯的办法 要你立即‘转变’（即叛变）立即供出组织关系 立即破获共产党机关和逮捕共产党员 三个‘立即’做到了 就让你加入他们的‘青年爱国组织’从事反共事业 也叫做给以“出路”。

在头一周内 敌人的办法从表面上看来是‘成功’的 那些对党不满的分子，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分子，在敌人的这一猛击之下就立即‘转变’了 叛变者多是中央新派来的人 而其中又多是留苏学生，他们的叛变又影响一些其他的人，一时就形成了所谓叛变浊流。

伪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是把一幢大房子隔成 3 间牢房，